

崔永徽導演採訪記錄

崔永徽導演畢業自輔仁大學中文系，擅長以影像傳達文學及文化等題材。其紀錄片作品見諸於台灣與國際影展播映。崔女士於 2019 年 10 月 17-18 日訪問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院臺灣文化與文學研究所。17 日先與觀眾一起欣賞其劇情長片《只有大海知道》並回答觀眾提問。18 日，崔導演則接受李台元老師研究課上學生所準備的採訪提問。

問：電影裡面有一個場景，男主角要穿丁字褲時很抗拒。這件事情真的有這麼困難嗎？那麼，女孩子對自己的傳統服飾的想法如何？

崔永徽：在一、二十年前確實如此；曾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她國小的時候學校帶他們來台灣做一個表演交流。當時大家都穿傳統服飾，男生就是要穿丁字褲。當他們遇到別的學校的學生取笑他們，蘭嶼的男學生都嚇壞了，跑去躲在女生後面，叫女生保護他們。因為其它人會取笑他們穿丁字褲是暴露的，不了解這是一種生活文化。所以就蘭嶼的傳統服飾來說，男生確實就比較會有障礙，但是女生的傳統服飾是很美麗的衣裙，所以通常女生們蠻願意穿的，不會有排斥感。所以在過去比較不重視文化多元差異的年代，對蘭嶼孩子們來說，丁字褲很容易會被外人拿來開玩笑，甚至被貶抑，所以小男生要穿上丁字褲的確壓力蠻大的。

問：在電影裡有一個場景是某個人在一個酒吧表演。他唱的那首歌我一聽就覺得旋律非常熟悉。這個讓我懷疑那首歌是蘭嶼本地的歌或者是台灣原住民共同的民謠？

崔永徽：那首歌是來自蘭嶼的傳統歌謠，當地人稱之為《蘭嶼情歌》，它最早的作者是誰已經不可考了，但幾乎每個蘭嶼人現在還是都會唱這首歌；早期我去蘭嶼旅遊，也聽朋友唱過，雖然語言我聽不懂，但覺得旋律很美很好聽。臺灣知名的歌手陳建年，以及蘭嶼的歌手希·滿棒都曾在臺灣本島台東的鐵花村演唱過。據我所知，這首歌有一個通用的歌詞版本，但同樣的旋律也有各種不同的填詞。我在電影裡面採用這首歌當插曲的起源，有個小故事；因為蘭嶼椰油村裡出一位歌手周莉文，她曾在原住民電視臺參加歌唱比賽，以演唱這首《蘭嶼情歌》得到比賽的冠軍。當時周莉文唱的歌詞版本是她母親幫她填的歌詞。我大約是 2012 或 2013 年在 youtube 上聽到周莉文的版本，聽到時非常驚訝，因為這個歌詞版本幾乎就是在描述椰油國小舞蹈隊到臺灣參加比賽的故事；那時候是我電影開拍的前幾年，但是我已經寫好了劇本，所以當聽到周莉文版本的《蘭嶼情歌》，我感覺整首歌簡直就是在講電影裡的故事！例如歌詞說「椰油的孩子們要出島去參加比賽，希望能把我們的文化帶到外面的世界去，祝福這些孩子能夠順利成功」等等，和我電影內容幾乎是一模一

樣；只有一、兩句歌詞比較是宗教性的，稍微有點不符合，但也只要稍做修改就可以。而這位歌手周莉文也是蘭嶼出身的最有名的一個歌手，她不但出了唱片，在主流媒體上也一度很活躍，我也非常喜歡她的聲音，所以後來請求她來幫電影演唱插曲。當然最後電影並不是直接用了電視節目比賽的版本，而是請莉文的母親幫忙把幾句歌詞稍微做一點編修，好讓它更符合電影裡面的劇情，然後再請莉文來為我們重新錄唱。另外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錄音那天莉文還特別把母親從蘭嶼請出來，因為莉文已婚住在屏東，她從屏東上來臺北幫我們錄音，並且把母親也請來錄音室。這麼做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要確認錄唱時莉文的族語發音是否標準；雖然莉文會說族語，但她畢竟是年輕一輩，又長時間待在臺灣，所以她的母親決定全程盯場，確保女兒每一個發音都是精準的，不要出錯；否則萬一發音有點誤差，那對蘭嶼的故鄉族人可就無法交待了。然而錄音那天非常順利，莉文母親幾乎完全不需要糾正女兒的發音，她覺得女兒的族語演唱十分完美。

問：電影的片尾曲，崔導是如何挑選、邀請到陳建年為電影唱片尾跟主題曲？

崔永徽：電影的片尾曲也就是主題曲，主唱者是臺灣的知名歌手陳建年，他是一位卑南族人。陳建年其實是一位警察歌手，他最早因為自己喜歡創作寫歌、出了 CD 專輯，結果第一張專輯就得到金曲獎，而且唱片大賣，從此他在臺灣就成為家喻戶曉的歌手。不過雖然名氣很大，但陳建年依然還是在當警察，警察才是他平時真正的職業身份。很特別的是，大約近十年的時間陳建年被派調蘭嶼分駐所，而且剛好就在電影故事的椰油村；因為長時間住在蘭嶼，讓陳建年也幾乎成了半個蘭嶼人，所以這些年他也以蘭嶼為主題做過一些音樂創作，並且出了唱片。因為這些因緣，陳建年對於蘭嶼當然是特別熟悉又有感情的，再加上他的音樂風格也跟我這部電影很搭，所以就希望能請他幫電影寫一首主題歌曲，並且親自演唱。不過這過程還是有一點曲折，因為建年其實非常忙碌，所以中間一度他想要婉拒我的邀約，希望我找別人做主題曲；但很幸運的是在我的百般懇求下，他最後心軟答應了我。現在大家聽到的片尾那首主題歌曲，歌詞是我寫的，然後由陳建年譜曲演唱。另外就是，一直以來我都希望這首主題曲中間還要串進一段達悟族的傳統族語歌曲，因此我挑選了一首達悟族傳統兒歌，可惜建年說我挑選的兒歌曲調跟他的創作銜接不起來；幸好我們電影裡的老師本尊也是從小學音樂而且懂樂理的人，又對蘭嶼的達悟傳統歌曲很熟悉，他就幫忙另外找了一首調性能夠吻合的傳統兒歌《飛魚之歌》。現在電影的主題歌曲在中文歌詞結束之後有一段小朋友的歌聲，那就是由蘭嶼當地的小朋友用達悟族語演唱的《飛魚之歌》。這電影的主題歌曲創作的過程雖然有一點曲折，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完美的，讓我心裡對這件事非常感激。

話說回來，音樂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想要在電影裡想要強調的。例如我們的片頭曲的混音有放進老人的吟唱聲，那吟唱聲其實就來自電影劇情中，男女主角為了採集傳統文化素材，請老人家吟唱並且進行錄音的那一段。片頭音樂的作曲者以這段老人吟唱做為主題，加上其它的配器編曲，成了既傳統又嶄新的創作。總之在整支片子裡，很多地方我都希望能夠呈現出屬於蘭嶼的傳統歌謠和音樂。

問：我們剛才聽到有一個警察是來自台灣，然後派到蘭嶼去了，那我們還知道有一位老師也派到台灣去了。那麼蘭嶼那邊的漢人多嗎？在蘭嶼上的外地人還可以做點什麼？

崔永徽：蘭嶼島上的漢人漸漸地變多；有些人是因為公職被調派到蘭嶼，像警察歌手陳建年；但也有很多人是去那個短期打工，還有些是外地遊客，去了幾次之後就想在那裡定居下來，這其中也有近年人們想要逃離都市的一種趨勢。我曾經聽到一些故事，說也有年輕的女性因為很喜歡蘭嶼，一心一意想要嫁給蘭嶼人，就很積極的想在蘭嶼找到愛情，之後果然美夢成真，真的在小島遇見的愛情，從此就在蘭嶼永遠定居了下來。

問：是因為他們喜歡這個環境，然後剛好遇到那種 romantic 的男人就跟他在一起了？

崔永徽：確實有聽到不少 romantic 的愛情故事，不過比較特別的是，如果不愛蘭嶼、不喜歡這個迷你小島的生活方式，那就算遇到愛情也不可能會開花結果的。在我認識的朋友裡面，就有不少都是外地人和蘭嶼當地人結婚後，最後在蘭嶼住了下來，而他們都非常享受住在小島的生活。外地人在那邊可以做什麼呢？在蘭嶼上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有些是擔任教職當老師，另外很多人是經營觀光旅遊業，像是民宿、餐飲業，或是富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傳統手工藝品。但是很多蘭嶼人會說：這家是台灣人開的，那家才是蘭嶼本地人開的。

現在蘭嶼有一個現象是外地人跑去那邊做生意，以前觀光客在當地要租摩托車，通常都是跟自己住的民宿租摩托車，一家民宿可以出租的摩托車也只有少少幾台。但近年狀況變得不一樣了，現在外地人進去做生意往往投入了更大的資本，例如專業的摩托車出租店家、養了一次兩百台的全新摩托車，很容易就壟斷了大部分的市場，讓原本民宿自己的摩托車租不出去。這樣的現象從摩托車到咖啡店、民宿，甚至到浮潛業者等等，都有更大規模的台灣店家進來搶當地人的生意。導致本地人無法與他們競爭。這個對蘭嶼在地的觀光旅遊業是很大的威脅。畢竟在地的店家規模是很小的，也都是個體化經營，像更新、更便宜的摩托車出租，車子的供應量也更大，就遠遠贏過了原本在地民宿業者的摩托車出租生意。

問：蘭嶼離台灣有多遠？

崔永徽：坐飛機的話大概 20 分鐘，坐船的話大約 3 個小時。這要看當時的浪和風，風浪大的話很容易暈船。外地人常以為蘭嶼當地人不怕搭船，其實像電影裡面那個國小老師帶小朋友出來參加活動，一次出行可能就有 30-40 人，但一架飛機只能坐 19 個人，萬一風向不佳飛機班次也可能會被取消。所以通常人數較多的團體，進出小島會選擇搭船。以前我就曾聽說小朋友一聽到要去搭船，就嚇哭了，因為風浪大的時候搭船真的很容易暈船嘔吐，非常痛苦。我第一次搭船去蘭嶼旅遊時，不知道暈船的厲害，真的是像快要死掉的感覺...心裡一直想著能不能叫直升機來救我。拍電影的時候我跟劇組的人也坐過船過去，每個人都吃了暈船藥，結果暈船藥對我完全沒效果。

問：附近有醫院嗎？出事故的話有辦法去嗎？

崔永徽：蘭嶼島上有衛生所，但如果是較嚴重或緊急的疾病還是會送到臺灣，而最近的醫院位在臺東。2018 年冬天出了一個事故，就是因為有病患需要緊急送到臺灣就醫，結果天候太差、直升機墜海了。因為冬天那邊有強烈的東北季風，所以冬天搭乘飛機確實比較驚險，航班也經常因為風勢太大而取消。我自己也曾經搭飛機遇到大風，一路搖晃到蘭嶼，嚇到腿軟...等到飛機終於著陸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能夠活著真好！我常笑說搭船是對身體的折磨，但坐飛機卻有更大的心理壓力。

問：家庭的語言環境對於 Language Shift 也會引起很大的影響。很多臺北的爺爺奶奶們跟自己的孫子說華語，但是說的時候一般情況下會有台灣口音。之前很多小孩聽不懂臺語或客家話，但是現在大家的意見慢慢的改變。這個是不是一個社會觀念的問題？

崔永徽：我問過我一位朋友，他的年齡和我差不多；我觀察他和母親用族語對談，但他和年幼的孩子說話時卻會用中文。因此我問過他：為什麼不跟小朋友也講族語呢？這樣語言不是才能傳承下去嗎？但他說，因為族語畢竟是一個適合以前社會的語言，很多現代化的東西或新的思維概念，族語裡面是沒有的，沒有那些詞彙。因此要跟一個兩三歲的小小孩用族語對談，對他來說也不簡單。像我自己現在也有小孩。如果我在台灣遇到年紀大的人，自然地會跟他們講閩南語，但我也同樣很難跟我的孩子用閩南語溝通，會覺得非常不方便；平常在家裡若要特別跟孩子說閩南語，我也確實覺得怪怪的；很自然就會和孩子用中文（普通話）對談，畢竟那是周遭大家都在使用的語言。但的確，某些傳統語言就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流失了。

問：那你覺得蘭嶼的族人怎麼想？

崔永徽：他們當然還是很希望能夠傳承。他們自己會辦一些活動去推廣族語。比如說傳統的歌謠比賽。然後又分成老、中、新和兒童組。這樣小朋友也可以唱族語的歌曲，參加比賽。定居在蘭嶼的外地人也會組成一隊，例如嫁來蘭嶼的蘭嶼媳婦會組成一隊。他們會通過這種辦法來延續語言的文化。當然椰油國小的舞蹈隊現在越來越有名了，也會帶來一些正面影響。但這都是一些補救措施，在語言傳承上家庭還是最重要的。

問：可是如果第一代帶第三代，那這樣是不是給語言的傳承一個很好的機會嗎？

崔永徽：有一次我幫蘭嶼人拍一個歌唱比賽。然後那個主持人說誰家族語教得最成功。因為爸爸媽媽出去打工了，所以很多孫子是給祖父母帶的，因為祖父母只會說族語，這樣情況下小孩族語一定會學的比較好。

問：好像昨天電影裡面我們也看到了孫子說華語，然後阿媽用族語回復。這是常見的狀況嗎？而且孫子生氣的時候，爲了安慰他，奶奶才會用一點點華語。

崔永徽：其實我們的演員，那個小朋友能夠講的族語非常的少。然後我們要求他熟背電影裡的台詞，包含祖母的台詞他也要會背。

問：所以小朋友在生活中不太懂祖母在說什麼嗎？

崔永徽：兒童這一輩平常已經不講族語了，簡單的單詞可能還好，但是長的對話確實有困難。像學校裡的比賽活動，他們也都會請族語老師為所有的要上臺表演的孩子一句一句地教，一句一句地背，這樣他們才有辦法在舞臺上去表演。不然的話，他們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金馬獎那天，我們本來沒想到我們的小演員會得獎。後來因為聽說他的呼聲很高，我才緊急要求他趕快準備得獎感言。因為原本我不想讓他對得獎有太高的期待，以免事後失望，所以我一直強調我們志在參加，不要去想會不會得獎的問題。可那天下午有同事告訴我說，我們得最佳新人的呼聲很高，那時候演員們都在飯店化妝準備，而我還沒到達飯店，所以就趕快打電話給現場的同事：讓他叫演員趕快準備得獎感言，而且我要求一定要用族語表達，彰顯他的達悟族身份。還好當天飾演祖母的老演員也在，就趕緊幫鍾家駿準備，後來他果真得獎，而他在台上用族語發表的得獎感言，感動了很多人。

像你們應該知道卑南族的一個歌手 Sangpuy（桑布伊）。Sangpuy 就非常厲害。但他也是長大以後回去學[族語]。他小時候都不會啊。他是長大以後發現說：

嗨，我是一個卑南族人，但我沒有辦法跟我的長輩溝通，不會講我自己的語言。然後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自己去學。這是很少見的，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這樣做。

問：我還有一個跟到現在講的不一樣的問題：為什麼電影裡好像見不到一件在蘭嶼比較痛苦的事情，就是核能廢料廠和蘭嶼人的反抗 - 裡。是因為一般的人不提這件事情了嗎？

崔永徽：不，他們都常在談，大家都會討論這個問題的。可是因為電影的主題是要講小朋友的故事，是關於親情和文化的。另外，我覺得核能廠這件事情是非常複雜的議題，是政治問題，也是一個被遺留下來難解的歷史問題（已經有三十幾年）。當時政府騙了蘭嶼人，說是要蓋一個罐頭工廠，製作魚罐頭出口到台灣，讓當地的人能夠有就業機會。蘭嶼人原本聽到這計劃還很開心的，認為這樣的就業機會對生活改善一定會有一些幫助。後來才發現根本不是一個罐頭工廠，而是被放置核廢料。其實第一次臺電把核廢桶運過來的時候，達悟族人就已經有抗爭行動了，那是蘭嶼史上第一次對政府的抗爭行動。可是沒有用，當時的蘭嶼比現在還要弱勢很多。那個年代原住民的聲音是沒有被傾聽的。政府真的是可以隨便欺負他們，所以那時候他們是非常的悲憤。

雖然還是有一些蘭嶼人為了生活、為了養家，必須在核廢貯存場工作。但近年來族人們越來越有所覺醒，也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情是很不公義的，再度開始進行反核抗爭，希望政府解決，但至今為止還是懸在那裡，無法解決，核廢料也沒有新的去處，不曉得能搬去哪裡。福島核災之後，蘭嶼當地也非常緊張，當地人也自己找一些學術單位來檢測核廢料的放射性物質，但民間自己檢測出來的跟官方來檢測的結果完全不一樣。官方檢測的都是安全的，但民間檢測顯示對人體是有很大的危害的。某些當地人生病或罹患癌症，他們也常懷疑會不會就跟核廢料的污染有關。

我的電影劇本寫作階段，也有蠻多人建議要不要把蘭嶼的核廢料問題放進來。這件事我也思考過，但是我後來發現提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跟我的故事主題無關，我的想法是不要把一部電影弄得太貪心，我就把一個故事講好，就夠了。

問：您將來要繼續做關於蘭嶼或者其他原住民的電影嗎？

崔永徽：有好幾個這樣的想法。但是現在還說不定哪一個想法先開發。有一個已經完成的紀錄片。它的內容是跟原住民比較沒有關係的。它確實是在《只有大海知道》之前就先拍好了。因為《只有大海知道》有它時間上必須要趕緊完成的緣故。因為蘭嶼的小朋友快要長大了，文化部又申請了輔導金，他也有一個合約的期限。還有，我在蘭嶼也很多年了，也會考量到蘭嶼在地朋友對電影的期待，不能讓他們一年又等過一年，如果氣氛冷掉了就更難進行了。所以就先把《只有大海知道》完成，反

倒是之前已經拍的紀錄片，就變成要放在《大海》之後再推出。關於原住民的題材，其實最近醞釀了好幾個，但我希望類似的議題就不要再重複了，比如說，在《只有大海知道》已經探討的像文化流失、下一代面對自我認同的這一快，也許就不需要再拍一個類似的故事。

而且想說，可以做一些不是過於嚴肅的話題。比如說現在我們的男主角。他現在是高中生了。15 歲了。他在臺北上學。他還是非常熱愛表演、唱歌和舞蹈。他其實一個人來臺北念書，他的家人都還在蘭嶼。我們幾個朋友都會照顧他。但他也很獨立而且保有自己很純樸的心態。我也蠻想說再為他量身打造，想培養他。因為他有一個目標：他非常熱愛演戲，但很多兒童的演員長大以後找到機會有困難。我是想培育他，讓他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問：達悟族的一個導演，2018 年大家有看過《十年台灣》嗎？《十年》就是香港來的 project，裡面有一部電影叫《惡靈罐頭》，是達悟族的一個導演拍的，我是認同他的立場，但覺得他好像不是拍給同溫層裡面的人看的。

崔永徽：同溫層這件事情在台灣原住民圈是蠻大的一個問題。就像台灣有原住民電視臺。可是，我們也會覺得原住民電視臺是原住民自己看的。它沒有辦法跟非原住民的朋友做一個溝通。《只有大海知道》的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可能是我自己不是原住民。我是從外面看進去的。可是我又是跟他們站在一起。這好像就會讓這部電影的跟一般人的溝通性比較強。可以帶著一般人走進去原住民的世界。

但我的身份要拍這種電影也會遇到另外一種尷尬，原住民朋友會怕我把他們拍成什麼樣。我畢竟還是一個局外的人。他們會極度焦慮，例如我拍片時會請顧問幫忙把關，包含美術道具、台詞等等，每一道都很嚴謹地幫我把關。因為如果我拍的不對，可能會被蘭嶼人批評，或是帶給大家不好的感受。另外就是也要思考到原住民刻板印象和標籤化的問題，例如我們有一場戲，因為角色遇到一些挫折、心情不好，我本來是想擺兩個啤酒罐，但是和顧問商量之後，擔心會讓外界又加深了原住民飲酒這些事的刻板印象，所以最後決定用一般的無酒精飲料瓶來取代。在這一類問題上，我會選擇尊重顧問的判斷，而不只是追求電影裡的表現。這就是我覺得這部電影有些邏輯會跟一般片子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我必須考量到在地人的感受。

整個拍攝過程當中，我的顧問真的是每一個鏡頭都小心的幫我把關。像一開始，祖孫兩人在採龍眼，但因為那幾個月的天氣和風向的因素，我們原本要拍攝的龍眼樹結不出龍眼來。所以，我們只好去別棵龍眼樹採下龍眼，用接枝的手法放到要拍攝的龍眼樹上，但是顧問很擔心會露餡，他說：不行，這個你們外人看不出來，

但沒弄好我們蘭嶼人就會發現怪怪的。所以為了把龍眼接枝做到完全沒有破綻，他親自爬到樹上弄了兩個小時，很辛苦地才弄到他覺得完美的狀態。後來拍出來，果然蘭嶼當地人也看不出破綻，完全天衣無縫。電影在台北進行試片會的時候。其實我們邀了非常多的各族的原住民朋友，有藝人，也有原住民導演，還有記者，各族的人都有。其實大家都在想一個平地人拍原住民題材，到底會拍成什麼樣子？後來電影散場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他們普遍都能夠認同這部電影；有的人甚至說，很意外一個非原住民的導演拍原住民題材，居然可以拍得非常道地。在臺灣當代，原住民族的主體意識是蠻強的。萬一我沒拍好這部電影，可能會冒犯很多原住民朋友。

問：如果遇到一些關於原住民的生活不太瞭解的部分怎麼辦？

崔永徽：我會不停得問他們。一定要確認到他們覺得是 OK 的狀態。就像剛才說的，有顧問在旁邊幫我看 Monitor 把關。然後我每拍一個鏡頭都會問他，確認有沒有問題。除了顧問之外，現場的演員也都是蘭嶼當地人，他們也都會給我許多意見和建議。其實我們大家都有一定的壓力，萬一拍出來的電影族人不認同，那麼就算外地人喜歡，也失去了意義。

拍攝的過程中當然還是會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和困難要克服，或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比如說關於船的問題。有場戲是叔叔要划船，載著小孩出海。這場戲原本角色訂好了，船也借好了，可是電影要開拍之前，原本要演這個角色的演員出了車禍，撞斷三根肋骨，就沒辦法來演了，因為這樣只好換人來演出。沒想到換了演員之後，原來要借船給我們的船主就不肯借了，因為是不同村子的人...。這件事當時讓我蠻意外的，我們外地人還是很難想像當地的生活文化，例如在不同部落、不同村子之間，傳統上是會嚴格劃分彼此的領域和漁場，而且嚴格遵守分際，這就影響到換角之後，因為不是同村的人，船主就不願借船了，我們只好重新想辦法。這些都是很特別的生活文化和界線，外地人往往想不到，但像這類型電影的特質，就是必須要去尊重這些在地的規範。另外就是，有華麗雕刻的達悟拼板船，也是價值連城的；畢竟現在這些傳統技藝都逐漸流失了，萬一我們拍攝的時候讓船身有個小小的擦傷，對船主也是很難交待的，就像開一部千萬跑車，會很擔心車身有任何一點小小的刮痕。因此拍攝划船當天，那位划船的演員心裡壓力也很大，萬一船身碰觸到海面下的暗礁受傷了，他會對船主非常抱歉，而我們電影團隊也不知該如何賠償了...。總之很多問題，其實都是我預想不到的，就像風向和氣溫濕度都會決定龍眼樹結果的情形，還有一個角色換人演，會讓拼板舟也連帶受到影響。

另外一個例子是婦女的頭髮舞，原本我的劇本設定男主角的房東太太是跳頭髮舞的成員之一，但後來才知道也行不通！因為找來支援演出頭髮舞的是椰油部落的婦女團，但演出房東太太一角的人選卻是另一部落的，然後...原來不同部落的婦

女是不會也不能一起跳舞的！甚至連為了演電影，都不可能打破這樣的規矩。對當地人來說，一起跳舞似乎象徵的是一個部落的團結和情感連結，就是因為在同一個村子一起生活，才能夠一起跳舞；這，就是當地的生活文化。我剛得知還有這樣的限制時，第一時間有點難以接受，心裡想說這只是為了拍電影，難道不能妥協一下嗎？但後來發現對演員們來說，她們心裡真的有一條很清楚的界線，不管是不是為了在電影鏡頭前面演出，因為是傳統頭髮舞，所以幾乎絕不可能跨村混在一起跳——因為這對她們來說實在太奇怪了！我後來只好調適自己，並試著去理解，這就是蘭嶼的生活文化，就算是拍電影，但某些生活文化卻是非常真實嚴肅的，不能有絲毫做假。所以最後我只好妥協，想辦法改劇本，來配合當地的文化。所以拍攝過程中，我常驚訝原來還有太多東西我是完全無知的，只好一邊拍一邊學，一邊適應。而這部電影最後拍完了，我跟當地人還能維持友好關係、沒有做錯什麼事情冒犯或傷害到他們，甚至於還能得到他們的認同，這樣一張無形的許可證，對我拍這部電影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畢竟我是以愛著蘭嶼這塊土地的心情來拍攝這部電影；做為蘭嶼的朋友，我只希望這部電影對當地而言是創造了正向的意義。否則，就失去做這件事情的價值了。

整理 Tom Luca Becker(湯姆·貝克)；校正 吳冠緯；定稿 崔永徽。